

激進勢力步步進逼 戴耀廷拒絕網綁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自去年中開始，「佔中」的領導權便逐漸旁落至李卓人手上，同一時間，「人民力量」、社民連更組成所謂「佔中後援會」，擺明車馬要「夾實」戴耀廷。這些行徑都對「佔中三子」構成極大的壓力。最令戴耀廷不滿的是，激進勢力在沒有得到「佔中三子」許可的情況下，就對外指沒有「公民提名」，「佔中」會立即發動，將「佔中」與「公民提名」網綁起來。面對激進勢力的咄咄逼人，戴耀廷等人知道不能再任其為所欲為，於是展開了連串反擊戰，先是堅持由朱耀明擔任「佔中」總指揮；繼而拒絕將「佔中」與「公民提名」網綁。戴耀廷這篇文章，正是向激進勢力還擊的戰書。

《文匯報》上周以一個專版分析激進勢力正全面搶奪反對派的領導權，指出激進勢力在反對派多個陣地正展開「搶灘戰」，引起了政界人士熱議。由前《信報》副總編輯游清源主理的網上新聞網站「852 郵報」亦對有關報道作出了分析，指「《文匯報》似乎欲借此類評論，眼見部分『泛民』正欲『網綁』之時，希望先發制人進行『反網綁』。」對於游清源的分析外界大可有不同看法，但他提出的一點卻是點中了這次政改戰的核心，就是「網綁」與「反網綁」之戰。簡單而言，如果反對派再次被激進勢力網綁，則普選危矣，「佔中」危局將無可挽回。相反，唯有擺脫激進勢力的網綁，特首普選才有望落實。

激進勢力全面搶奪反對派領導權

筆者早前曾經指出，「教協」理監事改選，正是激進勢力網綁民主黨的一個主戰場，近日韓連山等「進步教師聯盟」已經與「教協」領導層展開一輪互轟。「進步教師聯盟」意圖控制監事會，正是要以最小的力量來操控「教協」，他們將與張文光的團隊展開激烈競逐，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但另一個戰場又再次爆發一場「暗戰」。事緣在前一段時間基本上已全職寫作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日前突然在報章撰文，介紹所謂「商討十訣」。不過，所謂「十訣」只是陳腔濫調，並沒有太多意義。實際上，戴耀廷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此文反擊激進勢力意圖將「佔

中」與「公民提名」網綁的圖謀。

戴耀廷文中的語氣相當婉轉，但立場卻是相當明確，「對『和平佔中』來說，無論那最終的方案有與沒有『公民提名』，那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最後的選擇是大家在知情情況下經過商討和公平的議決程序下得出來的」。意思已經很清楚，就是反駁早前激進勢力向外宣稱，如果沒有「公民提名」就「佔中」的說法。戴耀廷現在就是出來以正視聽，告訴外界沒有這回事，等於是攔了「學民思潮」、「人民力量」、社民連以至公民黨一個響亮的巴掌。

有趣的是，戴耀廷身為「佔中」發起人，但在「公民提名」的立場上卻是不斷變化。最先當「學民思潮」等提出「公民提名」時，戴耀廷就曾斬釘截鐵地說自己「不贊成」，指方案「不現實」，「有錢人才能做到」。他並指，現時應融合各方意見，例如怎樣才可結合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及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早前提出的方案，令「學民思潮」被殺了一個措手不及。這說明戴耀廷其實一直都不認同「公民提名」，認為方案存在不少缺點，這樣他又怎會將「公民提名」與「佔中」網綁呢？然而，及後他的立場卻出現轉變，開始支持「公民提名」，並且指任何方案都不能缺少「公民提名」元素云云。不過幾個月的時間，戴耀廷的立場又發生改變，主要原因是激進勢力的「逼宮」

所致。

激進勢力咄咄逼人 戴耀廷決定反擊

眾所周知，自去年中開始，「佔中」的領導權便逐漸旁落至李卓人手上，同一時間，「人民力量」、社民連更組成所謂「佔中後援會」，擺明車馬要「夾實」戴耀廷。這些行徑都對「佔中三子」構成極大的壓力。就是因為怯於激進壓力的步步進逼，戴耀廷的立場亦開始軟化，更多地傾向激進勢力立場，希望能夠討好他們，結果便出現了對「公民提名」立場轉變的一幕。然而，戴耀廷的示好卻得不到激進勢力的善意回應，李卓人要擔任「佔中」的總指揮，「佔中後援會」更是不斷施壓。最令戴耀廷不滿的是，激進勢力在沒有得到「佔中三子」許可的情況下，就獨斷獨行的對外指，沒有「公民提名」，「佔中」會立即發動，將「佔中」與「公民提名」網綁起來，這顯然並非戴耀廷等人的原意，目的是要令「佔中」變得騎虎難下，也令2017年的普選變得渺茫。

面對激進勢力的咄咄逼人，令戴耀廷等人知道不能再任其為所欲為，於是展開了連串的反擊戰，先是堅持由朱耀明擔任「佔中」總指揮，令李卓人好夢成空；繼而拒絕將「佔中」與「公民提名」網綁。戴耀廷這篇文章，正是向激進勢力還擊的戰書。

警惕索羅斯的「空投陷阱」

蒯轍元 馬建波

筆者認為，索羅斯的悲觀言論有點「危言聳聽」，且同其他對沖基金及QFII等海外投資者統一行動如出一轍。97亞洲金融危機，大鱷們興風作浪的遊戲想必還記憶猶新。這或許又是索羅斯刻意「唱空中國」或「做空中國」的「空投陷阱」，值得投資者高度警惕。

去年下半年以來，一些西方對沖基金和QFII海外投資者，不斷借中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持續上升的負面消息，大肆炒作、拋售中國內地金融股，致使A股「中國工商銀行」等滬綜指權重股連續下挫，並引發市場恐慌拋售，一系列金融權重股相繼破淨（跌破資產淨值），滬綜指也再次跌破2000點的歷史大底，對市場信心帶來嚴重衝擊。其實對沖基金所為，大有刻意做空撈底之嫌，因為，中國經濟穩健，地方債務風險完全可控，且A股指數已連續4年處於歷史底部，金融權重股已顯現較好的投資價值。無獨有偶，新年伊始，世界著名對沖基金大鱷索羅斯再撰文描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未來的走向是全球經濟所面臨的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他警告說，中國迅速崛起所依賴的增長模式已經失去了後勁，要擔心，要非常非常地擔心！」

索羅斯悲觀言論「危言聳聽」

筆者認為，索羅斯的悲觀言論有點「危言聳聽」，且同其他對沖基金及QFII等海外投資者統一行動如出一轍。97亞洲金融危機，大鱷們興風作浪的遊戲想必還記憶猶新。這或許又是索羅斯刻意「唱空中國」或「做空中國」的「空投陷阱」，值得投資者高度警惕。從索羅斯的描述中可見，他對中國未來經濟的「擔憂」，主要基於三點考慮：

一是中國過去35年，以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為主的傳統經濟高增長模式已失去後勁，不可持續。

二是中國近年地方政府債務快速膨脹，中央政府為控制債務，避免債務危機，重啟高能耗和過剩產能投資，產業模式不可持續。

三是全球治理缺乏國際共識，會加劇敘利亞等國地緣局勢動盪和人道主義危機，及全球氣候暖化，中國面臨的挑戰並非如此。

首先，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對外開放的加快，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在「出口、投資為主和消費為輔」的傳統增長模式

支撐下，中國經濟迎來了長達35年的高速增長，GDP年均增長達9.2%，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2008年9月，因美國次按債務危機深化而導致的華爾街金融海嘯全面爆發，國際市場急劇萎縮，全球經濟陷入衰退或低迷。中國經濟也受到衝擊而失去雙位數的增長動力。反映過去以「出口導向和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為主的主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受到嚴峻挑戰，已不可持續，並帶來「產業重置、資源錯配、高能耗、高污染和產能過剩」等產業、經濟結構不合理問題，並已引起中央高度關注。為配合歐美緊急推出挽救經濟的全球寬貨幣政策，中國也推出了4萬億「拉內需、保增長」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貨幣政策（也同時埋下地方債問題的伏筆）。目前，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已正式啟動實施。

GDP調降立足「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

其次，2011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十二五」規劃綱要，將「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確定為不低於7%，不再強調「保8%」的增長基線。2012年中央「兩會」已確立未來總體經濟方針為「調結構、拉內需、穩增長」，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確保「穩中求進」的經濟增長，並將經濟增長目標首次調降為7.5%。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又確立了包括：財政、金融、經濟、社會、文化、行政和生態環保等11個重點領域的深化改革方向，並確保實現未來不低於7.5%的經濟增長目標。標誌着中國未來將不再以GDP論英雄，而是要立足於「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基本方針，建立一套科學、合理、協調的綠色GDP相關經濟指標評價體系。中國GDP增速的主動調降，正是與國家「十二五」規劃和十八大改革目標銜接，並引導各方把工作中心轉移到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上來，全面推進節能、環保、生態和高增值循環經濟的發展，確實提高GDP增長質量和效益，以利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因此，中央確立7.5%的經濟增長目標，

符合中國產業、經濟與社會、民生改革，及轉型發展的戰略方向，是中國產業與經濟結構主動調整，及可確保實現的合理目標。而非索羅斯所言經濟增長模式「缺乏後勁」的表現。據專業機構預計：2013年中國GDP將實現7.6%—7.8%的增長，遠高於IMF去年10月預計歐盟1%和美國1.6%的經濟增速，並將帶動全球經濟實現3%的穩定復甦。

地方債務規模家底已摸清

再次，中國地方債務規模家底已摸清，風險處於可控範圍。由於2008年9月中國啟動4萬億量寬政策以來，撬動地方固定資產投資、基礎規模快速膨脹，導致近年地方債務規模和風險大幅上升，並引發國內和國際金融界的高度關注。2012年以來國家審計署成立專責工作組，對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進行全面審計調查。根據最新公佈的數據：截至2013年6月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及或有債務總額達17.89萬億，較2010年底省市縣三級債務總額10.72萬億急增67%，表面看形勢十分嚴峻。但目前，全國政府負有償還責任負債率為36.74%，加折算後的或有債務，總負債率為39.43%，遠低於歐美和日本的政府負債率，及國際60%的負債率風險控制標準。同時，央行已採取措施，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穩健信貸規模、嚴控地方舉債，並展開債務資產重組，逐步消化債務負擔、降低負債比例。反映中國政府有信心控制總體債務風險，市場並未出現恐慌。索羅斯所謂「中國央行2012年大力控制債務，但隨後中國經濟遭遇了『真正的困境』（即：經濟下滑）。中共下令鋼鐵廠重啟熔爐，銀行家放寬信貸，情況隨之有所好轉」，擔心政府債務規模再度失控與事實不符，設下「空投陷阱」意味明顯。

還有，自習李新政以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正積極展開同歐美和俄羅斯的強勢外交互動與互惠合作，並與美俄謀求構建順應國際新形勢的新型大國關係和國際戰略安全、戰略平衡格局。敘利亞「化武換和平」的啟動和伊朗核談判的順利進展就是一個良好開端。中美俄之間不斷增進的戰略互信、互動、平衡與合作，必將有助消弭地緣局勢的動盪，促進世界和平、生態環境改善和全球經濟的穩定復甦。因此，索羅斯關於「未來各種國際政治問題將衝擊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擔憂也是多餘的。因此，廣大投資者應警惕勿跌入索羅斯的「空投陷阱」。

紓緩零售業勞工短缺的方法

Shelf Label System)。

電子價格標籤系統是一種放置在貨架上用以代替傳統價格標籤的電子裝置，它主要是由電子價格標籤及資料登錄系統兩個部分組成。其運作原理是將電子標籤安裝在商品貨架上，再通過無線發射，將需要顯示的商品資訊即時發送到對應的電子標籤上，而總公司更可以通過互聯網同時控制所有分店的電子標籤。整個過程中有關電子標籤不需要連接其他裝置，最新技術的電子標籤更能在不需要外部供電的情況下長期運作。

零售業科技提升生產力

使用有關系統能為零售業帶來一系列的好處；首先，價格可以做到即時同步，總公司可以通過互聯網隨時隨地改變所有對應的商品標籤所顯示內容；其次，有關系統可以與庫存系統連接，有需要時更可以顯示庫存資訊，提高理貨效率；同時，因為商品標籤是通過互聯網系統進行更改，可避免出現忘記個別標籤變價而在顧客結帳時產生的誤會；此外，使用電子標籤可以減少更換標籤時所需的資源；而電子標籤除價格外亦可以顯示其他資訊，為顧客帶來另一種購物體驗。

此外，電子價格標籤系統可以紓緩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香港零售業長期面臨人手短缺，以致前線人員工作量大增，間接令服務質素下跌。而使用電子標籤可節省大量人力，減少前線人員的工作量與出現失誤的機會。同時，前線人員可以將精力集中在服務顧客上，提高服務質素以及其收入。此外，使用電子標籤能創造傳統職位以外的就業機會，例如管理相關電子系統的專業人員，提升形象，吸引年青人入行。同時，電子標籤可顯示不同的商品資訊，因此亦可以隨時轉換為培訓員工的工具，以應對員工流動性高、培訓不足等行業問題。

其實，電子價格標籤系統只是眾多的業界新技術之一，業界的發展還有許多可能性。當然，轉用電子標籤需要先投入一筆資金用以更換現有系統，所以筆者亦認同零售業人力發展專責小組的報告中，有關需要支援中小企提高生產力及採用相關技術的建議，推動業界以及相關行業的發展。新技術發展難免會減少本地的基層職位，但若能同時創造一些基層以外的技術職位，可減低勞動力市場錯配，吸引年青人入行，值得考慮，新的施政報告中計劃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可給業界很大的幫助。

「馬房論」才是民主倒退



■王庭聰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法律依據，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所以簡單來說，沒有基本法，香港就沒有普選。

對於在提名階段，如何表現民主程序，目前社會還未有充分討論，但反對派已經標籤為「篩選」，並大肆炒作「『泛民』不入閘，就非真普選」、「普選無篩選」等等。

選舉制度須一視同仁

反對派能入閘，才算「真普選」，這種想法，才是真正罔顧選舉辦法的公平公正。我認為，只要一視同仁，確保所有合資格的參選者，得到公平對待，就是沒有「篩選」。沒有人得到任何優待，就是公平公正，依法辦事。

提名制度應建基於合法、公平之上，讓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士以政綱和表現爭取提名委員會支持。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規定將來的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正是要貫徹均衡參與的原則，確保提名委員會能夠體現社會的整體利益，不會偏重某一階層，也不會偏向某一界別。不論是建制派還是反對派人士，有心參選特首者，都應以政綱爭取支持，並且接受遊戲規則，絕不能輸打贏要，更不能設定一個保證某派別人士「入閘」的選舉制度。

過去兩屆特首選舉，沒有保障反對派「入閘」制度，梁家傑及何俊仁不是都通過公平競爭，爭取選委支持，順利入閘嗎？我們不能偷換概念，要求將來的普選制度必須確保反對派人士「入閘」，這種說法是不民主、不公平的。所謂的「馬房論」，我敢說，才是真正的民主倒退，甚至是法治倒退。

另一方面，選特首就像選新抱，我們可否接受一個天天同自己頂嘴、破壞家庭和諧的媳婦呢？所以候選人在政治上愛國愛港，要得到中央認同也是不用爭議。目前，不少反對派人士在發表意見時，採用過激手段，如在

議會上「掙蕉」、高舉「米字旗」、呼喊寧願回到英治時代。我認為，這種手法已經超出了可以忍受的底線。試問，站在政治角度上，如果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和中央格格不入，如何推進香港的政制發展？又如何鞏固兩地融合，化解兩地矛盾？試問，一個在議會上「搞事」，擾亂議事日程的人，又是否能夠肩負起特首之重責？

「選委會」過渡為「提委會」

反對派炒作所謂「無篩選」，只想剝奪「提委會」的權力，這樣做不單在法律上講不通，就連實際上亦無可能操作。

我認為，應該直接將現時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轉化為2017年普選特首的提名委員會，即是組成不變，但功能改變。因為現時的四個界別各佔委員會25%的比例結構，已經達到均衡參與和具廣泛代表性。為了體現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制度，建議如果有三個候選人，每個「提委會」委員就有三票，而每一個候選人不可以同時得到三票。最終獲得過半數票的人，就可以被提名參選，由全體選民投票選出。另外，特首候選人數亦不宜過多。為了讓選民有充分的時間了解及理性分析討論各個候選人，我認為，特首候選人數不宜多於3個。在整個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中，「依法辦事」才是真正邁向普選的正確方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王庭聰

